

森鸥外历史小说研究

SENOUWAILISHIXIAOSHUOYANJIU

赵玉皎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森鸥外历史小说研究

赵玉皎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森鸥外历史小说研究 / 赵玉皎著. —天津: 南开
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310-04851-9



Ⅱ. ①赵… Ⅲ. ①历史小说—小说研究—

313.074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294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北京楠海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2 插页 168 千字

定价: 23.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前 言

随着明治时代的终结和大正时代的开始，日本近代文学家森鸥外进入了他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期。森鸥外的历史小说创作于他的“丰熟时代”，包括多部晚年代表作，这些作品不仅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更是森鸥外思想的表达，是研究他晚年精神结构以及精神运动轨迹的重要材料。

本书试图从森鸥外的历史小说与他的精神结构之间关系的角度切入，对他的历史小说整体做出一个归纳性的研究。即通过研究历史小说这一森鸥外在特定期限内的创作，分析他的创作意图，解析此时期内森鸥外精神结构的主要层面，并通过与这几个层面紧密关联的问题意识，来探寻森鸥外这位“时代的人格化”的明治知识分子的精神运动轨迹。

本书采取作品论与作家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论述。前三章为文本分析，将森鸥外的历史小说依据主题和创作意图分为三部分，即对武士精神的乡愁、儒学式的秩序主张和对高的精神境界“道”的追求。这是森鸥外在历史小说创作时期的精神结构的三个主要层面，它们分别与鸥外终生关注的三大问题相关联，即对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西洋与日本问题的思考，身为国家运营者与文学者所必须面对的秩序与自由的问题，以及内心如何求得安宁自足的问题。

第一章从武士精神探求的角度分析武士题材作品群。笔者认为森鸥外的创作意图不在于对封建武士社会的制度和伦理进行臧否，而在于对封建社会制度框架下，被武士伦理道德规范束缚的

人所表现出来的可贵精神的关注。第二章从“士”、“君”、“女性”三方面的创作来分析森鸥外的秩序主张。他的批判和称许都以不破坏既有社会秩序的框架为界限，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带有儒学色彩的秩序观念。第三章从追求高的精神性的角度分析《高濂舟》和《寒山拾得》。随着人生晚岁的到来，鸥外原本精神结构中出世的一面比重日渐增加，探寻有余裕的、宽大超脱的精神，获得内心的安然自足成为此时的鸥外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第四章从森鸥外身为国家运营者之一员的“公”的立场角度，分析历史小说的创作与他在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思考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从“私”的对内心精神性追求的方面，分析历史小说与鸥外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求道精神之间的关系。鸥外终生以一位“双足”学者的立场，试图促进日本以一种理性的、调和的方式迅速完成近代化，历史小说的创作是鸥外这一思考中的重要一环。同时，森鸥外从往昔之人身上看到了人性中的理想光辉，内心从否定意识转向肯定意志。历史小说中的“谛念”上升到了出世的、宗教式的境地，每一日的事物皆是“道”，这是东方式的“谛念”的枯淡极点，也是有道者的境地。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1
一、历史小说在森鸥外创作中的位置	1
二、先行研究综述	15
三、本书的研究目的、方法和结构	19
第一章 对武士精神的乡愁	21
第一节 超越功利的献身精神——《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	21
第二节 “意地”——历史制约下的自我主张	41
第三节 对西洋的胜利——日本传统精神的再发现	58
第二章 执着的秩序主张	79
第一节 逸出体制的“士”的挫折——《大盐平八郎》	79
第二节 投向为政者的视线	94
第三节 秩序框架中的理想“妇德”——以《安井夫人》为 中心	105
第三章 寻求内心的自足	122
第一节 愚者的神性光辉——《高濂舟》中的道家思想	122
第二节 无用与有道——《寒山拾得》	135

第四章	“公”的使命：历史小说与“修建中”的思考与行动	148
第一节	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与西洋问题	148
第二节	国家运营者的秩序立场	166
第五章	“私”的修行：历史小说与森鸥外的求道精神	177
第一节	旁观者立场的超越	177
第二节	“谛念”的极点——“道”	180
结语		187
参考文献		191
附录 森鸥外年谱		198
后记		207

导 论

一、历史小说在森鸥外创作中的位置

(一) 森鸥外：参与“修建”的明治知识分子

提及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学家森鸥外，最广为人知的比喻，当属木下杢太郎所称的“底比斯百门大都”，以古埃及的“百门之都”底比斯来赞美森鸥外文学活动的广阔性与丰富性。从留德归来的1888年开始，至1922年去世的35年间，森鸥外的文学活动几乎涵盖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所有方面。他译介西方诗歌与浪漫小说，引入近代美学思想，开展文艺批评，尝试文体变革，创作了题材最为广泛的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写作和翻译戏剧，并且在晚年创造了明治时代唯一的新文学形式——史传。他自小接受传统的儒学汉学教育，青少年时代接触西方自然科学，青年时代留学欧洲，熏染实验科学精神与西方近代文化以及自由思想，回国后供职军方，终生未离开仕途。上述经历使得他在学贯东西的同时，精神结构也甚为复杂，其中不乏互相齟齬甚至对抗的元素。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森鸥外可以说是将西方的近代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对抗和综合的人物，如加藤周一所指出的，森鸥外就是“时代的人格化^①”。

①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卷》，叶渭渠、唐月梅译，开明出版社，1995，P310。

森鸥外本名森林太郎，1862年生于日本石见国（今岛根县）津和野藩的藩医家庭，童年时在藩校学习四书五经、左国史汉等汉籍经典。1872年10岁时随父去东京，开始学习德语，1877年进入东京大学医学部，1881年东大毕业，随即进入陆军任军医。1884年10月至1888年7月，森鸥外被陆军派遣留学德国，研究军阵卫生学。归国后继续军职，仕途虽有曲折，但大体平顺，1907年45岁时升任陆军军医的最高位——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在此任上直到1916年引退。1917年底，他被任命为皇室博物馆总长兼图书监，1919年又被推举为帝国美术院院长，他担任这两项职务直到去世。

由于本文主要是在日本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来研究森鸥外，因此开篇将他称为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学家”，但在理解森鸥外这一人物时，很显然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不是狭义上的文士，而是自始至终位于体制内、不遗余力地推进明治国家近代化的国家运营者的一员。这不仅表现在他终生的官僚身份上，更体现在他内心的使命感或者说精英意识，即自己的才识为时代所需要，明治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需要自己这样学兼中西的“双足”知识分子来承担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这种明治式的使命感，不仅与森鸥外本人的家世、教育、个人经历有关，更与整个明治时代的大背景密切相连，它不仅表现于森鸥外这一个体身上，更是与明治新国家一同发展、成长的知识分子的共性之一。接下来，本文从三方面来阐述森鸥外所怀有的“明治式的使命感”的来源与含义。

1. 家的期待与时代要求

森鸥外生于津和野藩的藩医世家，他出生的文久二年距明治维新仅有六年，全国上下因为尊王或佐幕、攘夷或开国的争论和骚乱而动荡，日本处于维新前夜的不安之中。

但森家所在的津和野藩，只是日本西部一隅的一个仅有43000石的小藩，时代的激变并没有过于影响森家，在鸥外幼年和

少年时代，家庭及周边的气氛是很平稳安定的。可以说，对于鸥外来说，比起大时代的变动来，“更为重要的倒是他的家庭状况，以及在封建时代身为长子意味着什么^①”这两点。

森家从17世纪中期开始，代代为津和野藩的典医，原本是被允许骑马的士族身份（「馬廻役」），俸禄80石，但在鸥外祖父那一代因故^②被降格为准士族（「徒士」），俸禄也减为50石。鸥外的父亲森静男原是周防国吉次氏之子，作为婿养子入赘森家。因此，在鸥外诞生以前，森家连续两代皆是由养子支撑家业，且遭遇了身份降格和俸禄削减。在此背景下，长子林太郎的诞生自然意义重大，他被视为担负一家再兴的中心，从小被寄予厚望，精心教养。

谈到鸥外的家庭，不能忽视的是他的母亲峰子。峰子性格坚韧，是家庭事实上的主宰者，为了督促鸥外勤学，母亲在忙完一天家务后，于灯下自学鸥外翌日的功课，甚至通宵达旦，并时常劝勉鸥外“扬家名与国名”。鸥外的长子森於菟称峰子为“身在家中却燃烧着功名心的祖母”，认为“父亲之所以成就那样的事业，贤母的功劳是重要原因”（《解剖台旁》）。峰子于1916年71岁时去世，距离森鸥外的去世仅有六年时间，她的影响几乎笼罩了森鸥外的一生。峰子终其一生，不断鼓励鞭策着鸥外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前行，以母亲为代表的“家”的期待与压力制约着鸥外的人生走向，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出人头地的观念与家名再兴的意识相结合，原本是从江户时代就有的形式，但在明治维新的社会剧变期中，它还与没落士族这一问题相关联。从1869年到1872年，明治政府连续颁布法令，

① 生松敬三《森鸥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P2。

② 1842年（天保十三年），森家当时的家主、第十一世・九代的秀庵（亮良）从津和野出奔到了山口，造成森家一时间家脉断绝。森家只好从藩内的佐佐田氏过继来一位养子，这就是森鸥外的祖父森白仙（又作玄仙）。

废除传统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大名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将藩主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农、工、商则统称为平民，同时准许武士从事工商业，平民也可以担任文武官职等。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政府逐步减少士族俸禄，1876年9月，政府颁布《金禄公债条例》，一次性发给士族“金禄公债”，从而废除了封建俸禄制度。士族原本不擅长从事商业，难有经营成功者，最好的出路就是能在新政府体制中谋得一份公职，但据1881年（明治十四年）的《帝国统计年鉴》，在明治国家中谋得官职的士族只占16%，有84%的士族被维新后的新体制所拒绝^①，其中不乏有生计艰难，不得不变卖房屋或去工厂做工以谋生者。也就是说，在鸥外少年时代，森家在期待长子进入新体制上层的梦想之前，先要避免家业的没落。

鸥外的父母都是聪明勤勉之人，人生态度十分积极。1872年，森静男作为藩主侍医移住东京，他对新形势反应敏捷，进入松本顺门下学习西医，领先于时代吸取新的知识，后来自己开业行医，在维新的混乱期依靠专业技能支撑一家生计，可说取得了成功。鸥外后来在小说《半日》（1909）中，描写了文科大学教授高山峻藏的成长环境，“老人不顾自己年事渐高，一心为孩子们着想。孩子们都以学习上进、让父母高兴为乐。没有什么财产，财产就是志向和才能，全家过着奋发向上的生活。当时，希望之光充满家中，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见面便是欢声笑语”，可以从中窥见森家当时的气氛之一斑。家中空气积极，父母身体力行，此种家庭中出人头地的实践，为勤勉、克己、节俭等道德所支撑，这与日本的国家近代化的步调一致。既然旧幕藩体制下武士身份的特殊待遇已经不可复得，那么摆脱没落就是对明治新社会上层的上升志向，这一点福泽谕吉已在《劝学》中明确指出。建功立业

^① 转引自矶田道史《武士的家计簿》，新潮社，2003，P176。

的观念本身，也与新时代中解放的青年的热情相应，是符合新时代的野心的表现。年轻的森鸥外就是在家的期待和时代气氛的鼓励之下，形成了强烈的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功名意识，开始了他的明治知识精英之路。

2. 儒学体验

作为幕末出生、以明治中后期为自己一生中主要活跃时期的明治知识分子，森鸥外有着明治人共通的特征，即精神结构中的儒学因素。在他们思想形成时，儒学的传统都占有极大比重，这一传统作为少年时代的直接生活体验而融入心灵深处，这与学习儒学以陶冶情操的大正人不同，也是明治作家与大正作家间的一个显著区别，这一点在后文中还会论及。

津和野时代的鸥外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学教育，据鸥外全集别卷的《自纪材料》，他5岁去儒学者村田美实家中学习《论语》，6岁师从米原纲善学习《孟子》，7岁正式入藩校养老馆，学习四书、五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汉籍。

在江户时代，各藩为了教育武士子弟，培养人才，相继建立藩校。津和野藩素有崇尚儒学的传统，养老馆由第九代藩主龟井矩贤创建于1786年4月，主要开设儒学、医学、数学、兵学等课程，由儒学学者担当教授，曾培养出国学家大国隆正（1792-1871），启蒙哲学家西周（1829-1897）等杰出人物。

森鸥外天资聪慧，更兼勤学不辍，在藩校中连续获得最高奖赏，第一年获赐四书正文，第二年获赐四书集注，有神童与天才之誉。作为津和野藩士族子弟中的佼佼者，展现在他面前的自然而然便是一条出人头地、显亲扬名的“正途”，舍此并无其他选项。

1871年，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政策，养老馆因此废止。翌年，父亲随藩主移住东京，鸥外也得到去东京学习的机会。他寄寓在同乡前辈、也是亲戚的西周家中，进入本乡的进文学社学习德语。1874年1月，12岁的鸥外进入东京医学校预科。三年后

的1877年，东京医学校改称东京大学医学部，鸥外成为本科生。

大学时代的鸥外，虽然学习的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医学，但儒学与他的关系并没有中断，连听德国老师讲课时，他都将德语迅速译成简洁的汉语来做笔记。鸥外日后创作的小说《性欲生活》（1909）、《青年》（1910-1911）、《雁》（1911-1915）等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在东大期间的生活。他四处探寻旧书店，并向依田学海学习汉文，向佐藤应渠学习汉诗，还时常请福羽美静、加部严夫等原津和野藩校的师长们指点自己的和歌创作。可以说，鸥外此时的文学趣味仍然以和汉古典书籍为主。

对于传统的古典教育，后来留德归来的鸥外曾经批判这“最违反精神发育史的道理”（《授教应合乎卫生之道》1889），但他本身就是如此被培养出来的人，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少年时代单纯的心中接受的汉学古典教育，给鸥外留下的痕迹比他自觉的要深刻得多。“少壮时代播在心田上的种子，是不会轻易断根的”（《妄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描述鸥外少年时代的汉学古典教养，尽管在他留学德国学习合理的实验的自然科学之后，一度否定古典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拂拭掉已经渗入身心的儒学汉学色彩。儒家思想本就积极入世，鼓励男性求取功名，以天下为己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角色，这与明治新国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赋予了鸥外明治式的使命感和家国意识。即便与西洋相遇之后，儒学色彩的价值观仍然作为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审美意识和感受的根源，而执着地存在下去。

3. 对有用性的执着

1881年7月，19岁的森鸥外从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毕业成绩在二十六名同级生中列第八。鸥外平日成绩优异，本来一直期待以首席毕业，成为文部省官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东大的第一代日本人教授。但由于成绩不理想，鸥外只能别谋他途，在

观望了数月之后，最后“遵从双亲之意出仕陆军省^①”，12月，被任命为陆军军医副，从此开始了长达34年的陆军军医生涯。

森鸥外进入陆军的重大收获是终于实现了留学梦想，供职两年半之后，1884年6月，鸥外被陆军省选派留学德国，这属于国家富国强兵政策的一个环节。1884年10月至1888年7月的将近四年的留学生活，是他一生中重要的承上启下阶段，对他精神结构的形成和此后诸多工作的展开，都有决定性的作用。就森鸥外与国家间的关系而言，留学极大地增强了他参与国家近代化建设的能力，也使得他对自己的有用性更加确信。处女作《舞姬》（1890年1月）中，太田丰太郎的好友相泽谦吉劝说他与爱丽丝分手的理由，即是爱丽丝爱恋丰太郎并非出于“慕才”，只是男女之间的情好，而一个才识兼备之人怎可为此种感情自误前程。也就是说，爱丽丝实际上对丰太郎的才学志向并不理解，二人在精神上的沟通层次并不高，如果去除异国元素和浪漫抒情笔调的成分，贫寒舞女与年轻官吏间的短暂爱恋本身，与古代传奇故事中的爱恋有多少差异也很难说——这也是诸多研究者认为《舞姬》中虽然出现了“真正的我”的自觉，但所描写的并非是“真正的爱”的原因。女子是小世界的化身，而青年本属于异次元的大世界，在大世界中他的才干才有用武之地，抱负才能得以施展，因此他对大世界的回归乃是必然。正如现实中“爱丽丝事件”的爱丽丝不是森鸥外真正的爱人一样，《舞姬》也并非什么自传色彩的忏悔之作，而主要是森鸥外实现文学理想的创作。《舞姬》中爱丽丝的怀孕、发疯是鸥外的文学想象，但丰太郎受到天方伯爵（隐指山县有朋）赏识、以出色的外语能力大显身手，却包含了青年森林太郎的自许和隐约的期待。鸥外在二十年后的小说《修建中》（『普请中』

^① 明治14年11月20日致贺古鹤所书简，岩波书店版鸥外全集第36卷，书信卷，岩波书店，1975。

1910年6月)中,描写了渡边参事官在修建中的上野精养轩和留学时相恋过的德国女子共进晚餐的场景,女子还有所期待,但渡边参事官已是态度冷漠。

“你是官吏吧?”

“唔,是官吏。”

“真有规矩!”

“规矩得不得了,已经变成真正的实利主义者了。……”

……

“可以吻你吗?”

渡边故意皱了皱眉:“这里是日本。”^①

正在修建中的嘈杂饭店,厅室中挂着的不和谐的画,令渡边感叹“日本不是艺术之国”。一边重复“这里是日本”,渡边参事官拒绝了女子的爱意流露,他自称实利主义者,并干脆地为女子现在情人的健康干杯,使女子失望寂寞地离去。渡边对于与西洋的别离心怀寂寞,但身处还在“修建中”的日本,他只能戴上实利主义者的假面。

对于“日本还在修建中”这一主题,三岛由纪夫称“没有比这更不会陈旧的主题”,认为渡边参事官“在‘日本还在修建中’这种严峻判断中生活,明治知识分子的绝望已经色彩浓重地展现出来,但与现在不同的是,一边沉浸在如此深的谛观之中,他依然参与那种修建”,“鸥外冷然的矜持非常吸引着我,那种矜持也是修建中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矜持^②”。且不论渡边对日本的近代化是否悲观到“绝望”的地步,但渡边也好,作者鸥外也好,这

① 此处及后面未标明译者的中文皆为笔者所译。

② 三岛由纪夫《鸥外的短篇小说》吉田精一编《森鸥外研究》1960, P131。

些“明治知识分子”一边怀着深切的苦恼，一边参与国家的“修建”，是不争的事实。《修建中》的渡边拒绝了昔日恋人，拒绝了西洋的“自由与美”，一边感到寂寞和压抑，但一边也意识到发展中的日本需要他的学识与力量，对于国家他是有用的，这并非自恋，而是明治时代的特殊性使然。于是他投身于国家修建之中，怀着苦涩的、又交织着几分自豪的使命感。

综观鸥外一生，这种明治式的使命感一以贯之。一方面，它表现为仕途上的积极进取，由于译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及1906年短歌会常磐会的成立，鸥外成功地与元老山县有朋建立了密切联系，《舞姬》中丰太郎受到天方伯爵赏识的想象终于实现。1907年，45岁的鸥外升任陆军军医的最高位军医总监，同时他还发挥着山县身边智囊团成员的作用，为山县制定方策提供咨询与建议，直接参与国家的运营。尽管与权力的接近给他带来不少负面评价，但作为一名怀有强烈参与意识的官僚，在体制内获得有利的地位，是最便捷的实现自己抱负的方式，这并非仅用“功名意识”可以概括，而是包含了对自己有用性的期待。

另一方面，作为启蒙学者和文学家，鸥外的勤奋罕有其匹，他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医学多个领域，为推进国家近代化的速度、纠正近代化过程中的偏差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后文中还会详述。在鸥外“三十多年的工作中，几乎包含日本文化的所有问题^①”，而在引退后一年半，他又重新出仕，担任帝室博物馆总长兼图书监、帝国美术学院院长，并进行与此职务相关的帝谥与年号的考证工作，以此来使用自己剩余的精力和才力。直至去世前的一个月，鸥外仍拄杖去帝室博物馆办公，在这一实现自己有用性的体制内终生从事着“修建”。

由于这种明治式的使命感的存在，尽管陆军和官僚体制对自

①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卷》，叶渭渠、唐月梅译，开明出版社，1995，P311。

由思想的约束时常给森鸥外的精神生活带来挫折与苦痛，但自始至终，他都保持着正视和参与现实社会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矶贝英夫认为鸥外“不是逃亡奴隶”，“日本文士中只有他一人属于异例^①”。对于森鸥外这种融军人、官僚、科学者和文学者等多种角色为一体的身份上的不纯粹性，矶贝氏高度评价了其意义所在，认为“森鸥外在日本文学史上存在理由的一半便在于此^②”。也就是说，森鸥外在文学上的业绩与他身为国家官僚的立场和责任密切相关，他在文学上的多方探索，是他在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思考与行动的一部分。这决定了较之于同时代的大部分日本文学家，森鸥外的文学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尤其是明治4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思想小说”、“哲学小说”，直接发轫于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着鲜明的指向社会的问题意识。这是森鸥外文学创作的本质性特点之一，也是本文在进行鸥外历史小说的分析和阐述时的重要参考。

（二）森鸥外历史小说创作的阶段性

所谓的“历史小说”，依照《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定义，是“以历史上的事件、人物、风俗等史实为素材而构成的小说。相对于时代小说以展开浪漫的情节为主、诉之以通俗的趣味，历史小说的目的在于通过依据史实的事件和人物的发展来描写历史的本质。^③”这一定义规定了历史小说的素材是“史实”，并从构成和目的的角度区分了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即在构成上，时代小说侧重于情节的浪漫性，而历史小说需要依据史实来展开情节；在

① 竹盛天雄等《研讨会日本文学13 森鸥外》（『シンポジウム日本文学13 森鸥外』），学生社，1977，P139。

② 同上，P135。

③ 《日本国语大辞典》第十卷，小学馆，1994，P1196。